

1989 運動中的民刊

邵江

獨立學者

摘要

本文檢視 1989 年民主運動中民刊的形式、內容和作用。伴隨著運動過程的遊行、靜坐、絕食、佔領天安門廣場、反抗戒嚴，民刊創造和擴大了公共空間，從校園的大字報牆或同仁雜誌，擴展為在城市多處空間的活字報；民刊隨抗議者的遊行散發到街頭和廣場，隨串聯傳播到不同的地區甚至境外。民刊探索和辨析民主理念，使之成為貫穿運動的論述。民刊主要的功能是運動策略動員和建立社會各界抵抗聯絡網絡，並催生了高校學生自治組織、隨後以天安門廣場為基地的其他自治組織，以及不同社會階層、代際和民族的抵抗行動。民刊未能使用對話方式有效和持續的與社會階層群體交流，將初始運動訴求轉化為民主運動的全民綱領，也未能使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相關性論述成為運動中有影響力的論述；民刊也未能辨析五四以來民主與愛國、強國的關係。運動後期一些傳單過分強調以佔領天安門為中心的抵抗，而不是建立社會各界基層自治組織並以此基礎為多中心，進行形式廣泛的系列抗爭。民刊為爭取全球民主和全面民主化、結束專制和帝國包括中共極權和中華帝國、以及尋找當下全球民主危機的出路，提供了豐富的經驗和教訓。

關鍵字

民刊、八九民運、六四屠殺、綱領和論述、政治和經濟民主、多中心與全方位抵抗

壹、民刊

本文中的民刊具有多重含義。首先，民刊可以簡單地理解為「公民雜誌」、「民間刊物」、「民辦刊物」或「非官方出版」。民刊可以直接從字面釋義，「民」意味著人民或公民，「刊」意味雜誌、出版物與印刷品。民刊是參與者自己決定編輯政策和自組織的出版物，編輯、製作和傳播獨立於任何官方部門。在中共統治下，民刊不僅提供給公眾獲取被官方過濾的敏感新聞，同時也提供了不同的評論，傳播有獨立批評意識的思想。簡而言之，民刊是指在專制——包括黨國體制——之外的出版物。民刊的特徵與官方出版物明顯不同（Shao, 2015: 1）。

在中文語境使用民刊最早出現在二十世紀初，民刊是非國家或獨立於官方的民間出版物。¹ 在中共統治下（Yu, Li and Chang, 1970）民刊可以作為「反映政治和社會的晴雨表」（Johnson and Prijatel, 2006: 88-125）。此外，民刊的混合形式作為其特徵，具有以下特點：

1. 「開放文本」，² 即混合文本或圖像的集合，鼓勵讀者不僅理解文本，而且激發讀者自己「解讀」文本。「解讀」是指讀者通過解繹，探索超逾文本本身的內容。這在嚴格審查體制中尤為重要。³
2. 出版和傳播目的在於提供另類敘述，尤其與官方不同，影響公眾。
3. 嘗試定期或有規律出版，直至被關閉。
4. 提供評論，而不是簡單的事件報導。
5. 複製多個文本。
6. 在結社自由受到限制的條件下，民刊是一種自組織形式。尤其是中國極權制度嚴格取締獨立民間組織，民刊靈活、有彈性、多形式的網絡形式，在嚴酷檢查和壓制下生存。民刊是學生、工人和民主運動的前奏，在缺乏組織或運動論述時，民刊是運動的大腦，組織抵抗行動。⁴
7. 相對封閉的環境下，一般是學生、工人網絡或支持民主運動的出版物。

1 在二十世紀初，民刊還使用在反對君主制體制的民國，更強調主權在民，民辦報刊極為豐富，參看戈公振（2011：第4、5章）、方平（2004）。

2 這裡借用 Umberto Eco 的詞語「開放文本（open text）」，請見 Bondanella（1997: 93-126）。

3 同上。

4 「運動的大腦和組織運動」是1957年《廣場》刊物創始者陳奉孝的說法，見 Shao（2015: 11）。

在中國 1949 年以後的語境中，我研究民刊的範圍擴展到公民表達的各種形式，包括牆上或建築物外表張貼的大（小）字報（牆報），這類有大（小）字報的牆也作為民刊的一種形式。許多民間雜誌轉載大字報的內容，由於雜誌容易攜帶和傳送，在異地的大字報也傳抄民間雜誌重要的文章。從這個意義而言，公民雜誌和大小字報互為資源，通常雜誌比大小字報保存更久，後來出版的民刊可以直接借鑒。民刊與民刊中的文章也可視為磚或石，建構了公共表達的牆；而民間公共表達牆張貼的文章定期更換，如同民刊的定期出版。這類牆——如民主牆——也可視為一種民間雜誌（Shao, 2015: 93-94）。

自 1949 年以來，大規模的社會運動和民主運動發生前都有持續的民間出版，1989 年的民主運動也不例外。在民主牆時期被鎮壓後，80 年代的民間異議出版、民刊形式的轉換和傳播，可以視為 1989 年民主運動的序曲。

對八九運動的研究，學術界主要以理論釋義運動。趙鼎新將五四運動、一二九運動和八九運動放入國家與社會的理論中解釋，分析八九運動受到壓制程度最高，運動的組織程度低，社會動員階層狹窄（Zhao, 2000）。⁵ 趙鼎新和其他學者（Wasserstrom and Perry, eds: 1992）部分解釋運動失敗的原因，但是仍然不能有效把握八九運動各階段的脈絡和問題。研究八九民刊更為有效揭示運動的論述以及分析運動中的問題，這對於在中國極權制度下突破壓制程度高和組織程度低的變革運動，以及理解和處理運動各階段的問題有重要的借鑒作用，本文從八九運動民刊探索和討論這些問題。

中國官方將八九民主運動和六四屠殺的歷史視為禁忌話題，監視或監禁中國境內許多重要的參與者，對相關資料實施嚴格檢查，大量相關資料仍未公佈

5 也參看陳小雅（2019）和 Francis（1989）。陳小雅回溯從八九民運史前十年的歷史，解釋為何八九民運爆發以及收集和研究的八九運許多參與者的記述，解釋了運動起伏脈絡。但是有一些事實與結論，包括事件的先後次序，能否構成因果關係，需要進一步辨析。Francis 文章分析政府以對話分裂學生是理解運動的重要緯度，但是將組織運動等同與運動中建立的組織，把運動的重要活動都歸結為運動中產生的組織實施的，這與史實不符，比如運動前期或六四屠殺後許多抗議，還沒有產生運動中的組織或運動中成立的組織已經基本不能運轉，但是在此期間的活動對運動的發展有重大影響或激勵未來的抗爭，在運動過程中全民介入的 427 遊行和 520 後堵軍車，運動中成立的組織與自發結合，自發中也體現各界中有機人士（借用 Antonio Gramsci 語）的自覺行動以及他們的行動網絡，自發行動很像現在所說的去中心化。1989 年運動在不同階段有時有中心，有時去中心化；有時同一階段同時並存，有中心或去中心化體現在不同場合。這些學者的另一個問題，是對運動的釋義過分窄化為只是學生作用或是官方產生的反效果。

或已經銷毀，這是深入研究運動需要克服的障礙。六四屠殺三十年後，隨著中華帝國的擴展，中國當局再次高調聲稱六四屠殺正當，⁶ 表明 1989 年歷史與現實息息相關，而六四鎮壓不僅塑造中國發展模式，而且事關世界範圍民主的生與死。保留、挖掘和反思 1989 年運動和六四屠殺不僅僅是歷史事實辨析的問題，而且涉及人類以何種知識、方式和價值生存，這對中國和其他世界的現在和未來具有重要意義。

本文主要來源為英國圖書館天安門檔案、香港支聯會收集的資料、記者和參與者收集的圖片和複印的原始文字資料、參與者回憶文章以及筆者與參與者的訪談。這些資料許多尚未正式出版，恕不列名所有資料提供者，一併致謝。

限於目前資料絕大部分來源於北京，本文重點討論和檢視在 1989 年運動期間北京製作和傳播民刊的特點，民刊創造的公共空間，論辯民主理念，運動策略動員以及聯絡各階層，創造中心不同群體的抵抗，最後討論八九年運動民刊的借鑒意義。

貳、塑造公共空間的活字民刊

自 1949 年以後，中共在北京拆除了城牆，擴建了天安門廣場，加寬了長安街、人民紀念碑以及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十週年的獻禮的北京十大建築，形成以天安門為中心、中南海為實際權力中心的北京建築群（Wu, 2005: 7-8, 26, 108-30）。這些建築創建了北京的政治儀式、慶典（國慶等節日）和閱兵的空間，塑造了具有象徵意義的黨國權力中樞，展示極權動員群眾的強大向心力，規範社會對領袖的崇拜和政治忠誠（*ibid.*: 85-104）。後毛時代中共有標誌性的建築包括毛澤東紀念堂等，繼續強化北京作為中共集權中心地位。

1989 年運動民刊像 1949 年之後的民刊一樣，繼承了印刷文化最重要的傳統：活字印刷。活字是活動、靈活可移動的字條和詞語，民刊正具有靈活、移動和運動的特性。1989 年運動中的民刊在塑造空間、靈活和快速移動方面

6 中共鎮壓八九年民主運動的宣傳，在六四屠殺後短暫使用「反革命暴亂」，然後長期使用「動亂」和「風波」淡化民間對運動和屠殺的記憶，從去年 12 月再次使用「反革命暴亂」，見新華網（2018）。這種變化也體現在對六四屠殺負有責任、去世的中共領導人的訃告中，見關嶺（2019）。中共對顏色革命的定義說明中共真正懼怕革命，懼怕革命推翻專制，中共是真正的反革命。中共對民主運動的鎮壓，不是宣稱的「平息反革命暴亂」，而實際是反革命屠殺。

尤其突出。尤其從 5 月 16 日到 6 月 3 日之間，標語、橫幅和傳單隨示威者流動，⁷ 隨車輛移動，創造了城市不同的抗議空間。標語、汽車標語、廣播車散發的傳單形成了移動民刊。⁸

1989 年 4 月到六月初，運動中的遊行、靜坐、絕食、反抗戒嚴、屠殺後的抵抗，發生在北京城區高校、工廠和市民居住區內，以及中共重塑城區的中共黨政機關和新聞機構周圍。伴隨 1989 年運動規模擴大，大小字報、傳單的張貼和傳播從北京高校校園擴展到天安門廣場和紀念碑、歷史博物館、中共黨政辦公地新華門外、紫禁城外牆等中共重塑的北京建築空間，包括通往上述地點沿途建築外牆、地下人行通道牆壁、電線桿、路燈柱，尤其是天安門廣場周圍路段的建築和長安街兩邊建築的外牆。⁹ 民主女神塑像顛覆黨國中央極權意涵，賦予天安門廣場截然不同的意涵。六四屠殺期間和之後民刊的抵抗，標示了北京特定空間的公民抵抗，予以這些空間完全不同的涵意。¹⁰

張貼傳單、報刊和大小字報移動的長捲布、活動展板、標語和傳單伴隨北京學生和其他社會階層在北京環城遊行，外地學生在北京火車站（1959 年十大建築之一）、北京高校和天安門廣場之間聲援和串聯，形成了活字創造的移動公共空間，對外地運動與北京運動的互動報導，也通過傳單、電話、電報和通信在北京重新複製和傳播。¹¹

7 許多標語和橫幅是傳單內容的濃縮，一些傳單論述、發展標語和橫幅的主題。

8 不像 1976 年 3 月有行駛火車車廂的抗議標語，現在沒有發現 1989 年運動中有行駛火車車廂標語，但有大量傳單通過旅行者傳遞。

9 大字報、標語和傳單出現的時間、地點見 Picke and Lambou (1990、1991、1994) 的紀錄。八九運動主要大事日期是 4 月 17 至 18 日、4 月 20 至 22 日、4 月 27 日、5 月 4 日、5 月 9 至 10 日、5 月 15 至 18 日、5 月 19 至 23 日、5 月 28 日、6 月 1 至 2 日等，參看這些日期的遊行、聲援路線、堵軍車地點。見北大和人大大字報、《新聞導報》、英國圖書館天安門檔案北京遊行照片，也看吳仁華 (2014) 相關日期大事記。

10 六四屠殺後，大字報（包括輓聯）張貼在北京西單、東單、高校工廠等地，傳單傳播空間更廣。而在北京，地下傳單從屠殺後一直持續，如陳晏彬與張亞飛的地下刊物《鐵流》、孫立勇的地下雜誌《鐘聲》和《民主中國》，都以傳單的方式散發，也包括郵寄和投遞。見馮然 (2009)、歐陽小戎 (2015)。1992 年 5 月 27 日，幾位異議人士計劃在天安門廣場用航模飛機撒傳單而被捕。丁子霖、蔣培坤和其他天安門母親成員記錄北京屠殺中受害者遇難地點，也標示這些空間的重要意涵。

11 北京民刊對西安、武漢、深圳運動的報導見《中國民運原資料精選》（一、二卷）(Selection of Source Documents from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vol. 1, 2) 和 Picke and Lambou (1990、1991、1994)。

1989 年民刊有創新的製作方式，使創造的移動公共空間擴大。1989 年運動初期的民刊類似民主牆民刊的製作方式，直接在蠟紙上刻印文章，油印後傳播。油印超過百份，導致刻印蠟紙的耗損，油印字跡不清，造成閱讀困難。在進入運動中期，民刊製作開始使用兩種並存的混合方式，以刻蠟紙油印民刊、手寫或中文打字後，再使用複印機製作的民刊、或刻蠟紙油印數份後，直接通過複印機複製，這些複印傳單數量不像油印傳單的數量受到限制，這類傳單隨著遊行和串聯使傳播範圍更大，同時張貼在城市的公共空間內。

由於四通中文電子打印機和複印機的普及，1989 年運動中後期（5 月到 6 月），不少學生自治組織開始購買四通中文打字機或直接獲得像四通一樣較少受到黨國控制的公司的捐贈。¹² 運動民刊的製作更加方便快捷，使用四通中文電子打印機打印文稿，然後使用複印機複製，以這種方式製作的民刊字跡標準清晰，便於讀者閱讀，保留時間更長。中文電子打印機和複印機製作的民刊迅速增加，傳播受眾範圍成倍上升。¹³

傳真機的使用也使傳單傳播更快捷以及覆蓋範圍更大，外媒報導抗議傳單的內容也傳遞到交通欠發達地區，這有助邊遠城鎮居民的快速動員。除了複印機和傳真機複製和傳播民刊，民間和媒體使用更多的照相和錄像設備攝錄運動參與者製作和傳播的大字報、傳單、刊物和標語。這些影像的複製和傳播也擴展民刊持續的影響，不同地區民刊伴隨運動的串聯使交流更有效，增加了運動的動能，形成同步和共振效應。¹⁴

參、論辯民主理念

1989 年運動民刊不僅擴展以往民刊的公共空間，而且承繼以往民刊理念的探索，在運動中辨析和深化理念的傳播。民主牆民刊和八十年代民刊深入討論的民主與專制、民主與法治、人道主義、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公有制（Shao, 2015: 129–170），對 1989 年運動中的民刊都有影響。在運動創造的公

12 1989 年 2 月，知識界開始使用計算機打印公開信，但是這種電子出版物仍不普及。參看方勵之（2012）。

13 許多大小字報是刊物文章和傳單的重要來源。標語的保存和傳播方式主要通過相片。

14 異地運動消息的轉遞，參看 Pieke and Lamboo（1991）；複製現象以及影響參看本雅明（2002）。

共場域中，民刊集中探索和辨析民主，民主成為運動動員最重要的論述。

運動中的民刊承繼五四以來討論的民主思想；探索和辨析民主主要通過三個方面：探索政治民主、社會民主和經濟民主、論述民主與人的自由和解放的關係、探索民主如何根除制度性腐敗。1989 年運動中，大量大字報、傳單、刊物和標語對此都有所體現。民刊中民主的論述受到外來影響主要有兩個來源：其一是美國革命中有關人的權利、法國大革命倡導的自由、平等和博愛，從運動中民刊大量關於民主的討論到民主女神像樹立在天安門城樓的對面都可以反映這兩次革命的影響；其二是共產主義早期思想。運動中的許多民刊都出現了這兩個來源。

民刊最集中討論的議題是民主，涉及到自治、自由、人權，包括言論自由（表達權利）、集會自由、結社自由、新聞自由、反腐敗、反官倒、共和國等理念與民主密切相關。¹⁵ 運動民刊將這些重要關鍵詞與民主理念的深入辨析緊密聯繫起來，同時闡明了中共在北京戒嚴是非法的。民刊把討論「什麼是民主」、「為什麼需要民主」和「如何爭取民主」聯繫起來，通過中共專制體制與民主截然對立的辨析，強調專制是制度性腐敗、對人民的奴役和迫害不可避免，爭取民主要從制度到實踐清除特權、廢除裙帶和領導人終身。只有爭取民主才能使人民擺脫被壓榨和奴役，防止制度性腐敗。人民在所有公共事務中實踐各種權利，全面參與公共事務，監督和制約所有握有權力者是實現民主的條件。不少民刊強調通過和平非暴力爭取民主，擺脫中國以暴易暴的專制制度的循環。¹⁶

北大傳單〈告全民書——論民主〉強調：民主是每個公民有權利發表自己的見解，參與制定政策、法律、選舉和罷免國家幹部，監督他們的工作及各項政策實施的權利。公民有保護自己的權利，尊重他人和全體人民權利的責任。現在，廢除少數幾個人說了算的專制制度，建立人民說了算的真正民主制度的

15 425 與 518 之間出現很高的詞頻是對話，這也反映這一階段運動的訴求。見本文第四部分。

16 感謝吾爾開希點評筆者另一篇文章〈從 1989 運動民刊看中國變革的動力〉。

遺漏的關鍵詞對話、以及劉曉波提出的和平、理性、非暴力，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mXP8nhUmaY>（從 42:34 到 52:54）。對話是從 425 到 518 運動的主要要求。許多傳單號召以和平方式爭取民主，見 518〈告北京各界人士書〉、520〈致首都工人書〉、〈首都人民致全國人民緊急聲明〉（非暴力不合作反抗戒嚴）。參看《民運原資料精選》V1: 17, 31, 37。

時機到了。你想腐敗官員下台嗎？你想讓官倒吐出他們吸進人民的血汗嗎？你想制止漲價，提高工資維護自己的利益嗎？你想永遠擺脫政治迫害的陰影嗎？那就參加這次鬥爭吧！民主是每個公民的事。只有大家齊心合力，才能廢除少數人左右全體人民，隨便可以命令一部分人民鎮壓另一部分人民的政治體制。難道我們還希望我們的子孫生活在這種人民代表大會只是個空架子，連共產黨總書記也不能保護自己的政治體制之下嗎？市民們，工人、農民，幹部們，知識分子們，解放軍官兵們，我們不能再觀望了。放棄自己的權利，意味著永遠做奴隸。在我們前面是你我的前途，國家的前途，子孫後代的前途。讓我們萬眾一心，為成為國家的真正主人而奮鬥吧！¹⁷

清華大學傳單〈民主意味著什麼〉，人民有權選擇自己的領導人；民主，意味著人民有議政權，有權了解事實真相；民主，意味著「文革」這樣的政治動亂永遠絕世。沒有民主就無法控制物價，政府隨意支出過多。民主使人民有效監督政府的收入和支出，防止貪污、揮霍、可以杜絕官倒。民主能當飯吃，民主值得我們用生命去爭取！¹⁸

呼應運動初期遊行靜坐〈七條〉要求黨國領導人及子女公布財產，許多傳單討論中國腐敗的根本原因在於沒有民主，專制本身就是制度腐敗，專制自己不能解決腐敗問題，只有民主才能防治腐敗。反對腐敗的方法是建立制約權力的機制，人民監督權力的運作。消除腐敗的路徑根除裙帶和世襲制，包括太子黨世襲體制，既深挖大規模和最高層腐敗，也需要監督和處理從上到下的腐敗。¹⁹

民刊中援引馬克思評論巴黎公社論述民主，「徹底清除了國家等級制，以隨時可以罷免的勤務員來代替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老爺們，以真正的責任制來代替虛偽的責任制，因為這些勤務員總是在公眾監督之下進行工作的」。²⁰讀者將這些論述與揭露中共在中國建立等級和特權的大字報相對比，²¹可以思

17 5月23日北大傳單BL2。BL是我對1989年運動民刊未出版資料的記錄代碼，下同。

18 5月23日清華大學傳單。

19 參看與北大〈告全民書〉和清華大學傳單〈民主意味著什麼〉類似的標語傳單〈深挖腐敗〉。

20 89年北大和人大傳單都引用馬克思〈法蘭西內戰〉初稿。

21 見〈試看今日之中國竟是誰之天下〉和〈官倒內幕〉。

考張曉輝在 1986 年〈青年馬克思主義者宣言〉中的論述，中共不是馬克思主義政黨，而是以馬克思主義名義建立和維護專制制度的政黨（十月評論編輯委員會，1989a）。²²

民刊中引述列寧，論述人民罷免權是民主中重要內容，「承認人民對代表的罷免是真正的民主，人民參與管理，清除國家等級制，監督代表工作」。²³ 列寧《罷免權法令草案》：「任何由選舉產生的機關或代表會議，只有承認和實行選舉人對代表的罷免權，才能被認為是真正民主的和確實代表人民意志的機關。真正民主制的這一基本原則，毫無例外地適用於一切代表會議，同樣也適用於立憲會議」。

1989 年傳單中列寧有關人民罷免權的論述，多次出現在李鵬宣布對北京地區實施戒嚴後。最早民刊闡明民主運動數百萬參加者直接要求人大常委會開會討論學運提出的重要問題是在 5 月 18 日。²⁴ 政法大學傳單〈戒嚴答問〉和北京航空大學〈李鵬宣布的戒嚴違反憲法〉，質疑戒嚴非法踐踏公民權利和憲法原則。

民刊中強調自治是實現民主的方式，學生自治、知識界自治、工人自治、市民自治，使用講演、靜坐示威、遊行，以致罷工罷市和罷課，促成體制不同機制分裂，支持民主運動的要求。²⁵ 公開信〈全國人大三分之一常委簽名要求召開人大緊急會議〉，說明全國人大常委會近半數常委（57 名委員），要求立即召開緊急常委會議。但是鄧小平等阻止人大委員長萬里到北京主持會議，並對已經簽名的人大常委施壓使其退出簽名。隨後當局逮捕了徵集人大常委簽名的人士，如高瑜和曹思源，導致了人大緊急會議的流產。²⁶

22 見〈腐化的根源是虛假的公有制〉（收錄於十月評論編輯委員會，1989b）；也參看拙作，邵江（2018）。〈青年馬克思主義者宣言〉與 2018 年高校改組之前的馬克思學會，支持佳士工人建立自己的工會的中國左翼青年的思想來源相似。也參看維護工人權利的《新生代》，這份網上雜誌編輯楊鄭君、危志立和柯成兵被關押（Financial Times, 2019）。另見沈夢雨、岳昕、張聖業、賀鵬超的自述，岳昕還參與在北大抗爭性侵。以上參見苒苒（2018）、佳士工人聲援團官網（2018）。

23 見 BL20。

24 見北大 518 教師大字報和傳單。

25 BL18。

26 這份公開信 5 月底在北京等地傳播。中共在六四鎮壓前逮捕了徵集人大常委簽名的人士。也參看俞梅蓀（2013）。

人權和新聞自由是 1989 年北京民刊中民主相關的兩個重要內容。民刊強調保護人權需要爭取民主，新聞自由和民間辦報是實現民主的條件，也是有效監督、制約權力和使權力透明的前提。比較 1989 年〈中國人權宣言 16 條〉和 1979 年〈中國人權宣言 19 條〉，兩個文本相同點是反對政治高壓，並提出解決方案。〈16 條〉更多直接援引《世界人權宣言》中公民權利相關條款，並改寫成簡寫版；〈19 條〉根據中共 1949 年到 1979 年間壓制狀況提出如何保障人權。〈16 條〉中第 14 到 16 條針對北京戒嚴，第 14 條內容是「法律是公共意志的體現，不以個人或黨派的意志而改變」；第 15 條內容是「軍隊中立，不得服從個人或黨派」；第 16 條為「民主、自治是社會的約定」。²⁷

1989 年運動後期，民刊出現頻率非常高的詞條是共和國。民刊將帝制和專制視為與共和、民主對立的政體。帝制將權力和國家作為君主的私有財產。傳單〈共和國不是私有財產〉駁斥了中共打江山坐江山的觀點：人民的犧牲不是為了某些人通向帝王之路，而是創造一個平等公正的世界。坐江山者應該為大饑荒、歷次政治運動中死亡的冤魂負責，共和國不是坐江山者的私有財產，人民不允許專制的改朝換代，坐江山者必須將權力還給人民。²⁸

民刊中以民主釋義權力的性質，如許多傳單和標語「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民主是對權力有效制約的機制」、「沒有制約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中國正是由於權力沒有制約，一小撮人可以任意胡作非為，肆意踐踏法律」、「沒有民主，中國祇能陷入獨裁和派系寡頭的統治」。²⁹政法大學傳單〈民主運動與中國前途〉強調：沒有民主，即使有四個現代化，也不會有全體中國人民的幸福。這些論述承繼了民主牆關於民主、現代化與人之間關係的討論。³⁰

1989 年民刊提出，民主首先是人的解放，反對權力崇拜，頌揚和期待清

27 1929 年，胡適發表〈人權與約法〉，羅隆基撰寫〈論人權〉，要旨是國家權力必須被公民授權，反對國家政府以各種名義剝奪人權、約法形式限制國家權力保障人權。從這個角度而言〈19 條〉和〈16 條〉有承繼性。但〈19 條〉和 L〈16 條〉對人權原則有所缺失，如法律由人民參與制定，人民沒有參與制定的法律，沒有統治人民的權威。〈中國人權 19 條〉請見任曉町（1979）。

28 BL050。

29 見北科大 525，與十月評論編輯委員會（1989b：54）。

30 見政法大學 523，以及魏京生（1979）。

官是奴性思維，爭取民主的過程就是有意識去除奴性思維，自主爭取自己的未來。民主運動目的不是奴隸運動和呼喚清官，而是爭取人民自己的權利促成民主化。³¹

工作和學習場所的自治也是民刊論述民主的重要內容。工人製作的系列傳單闡述中共工會不代表工人，工人必須通過建立自治會爭取民主，才能實現真正的當家作主。奪回被官僚和獨裁控制經濟的決策權、經營權和營銷權，才能維護自己的權益。工作場所／單位實施民主——包括政治和經濟民主——是民主的基石。³²

1989 年運動民刊反對專制，自下實踐和爭取民主，反對腐敗，通過民間追蹤、透明公開和推動追責相結合，這與中共宣稱的民主集中制和黨控制自上反對腐敗完全不同。民刊集中持續傳播和辨析民主保持運動的動能，同時聯絡了社會各階層，爭取了社會各階層廣泛的支持。

肆、策略動員和聯絡功能

1989 年運動中，民刊「最直接動員模式」承繼了 1980 年代中後期學生運動的模式，大規模出現大小字報，隨後學生上街示威。1989 年運動持續時間遠遠超過以往的學生運動，運動本身也超越了學生運動。這次運動是中共統治四十年以來，最廣泛的社會階層、族群和代際參與的自我解放運動，民刊在運動各個階段的策略動員發揮了重要作用。

民主牆後的民刊為後續的學運和民運參與者的教育、啟蒙產生了持續的影響，³³ 有政治和社會意識的大小字報為運動動員創造了公共空間。1988 年 3 月

31 北師大《民主論壇》第一期批評一些示威者舉著周恩來畫像遊行。

32 參看十月評論編輯委員會（1989：33-51）。這些論述與八十年代後期保守知識界人士主張新權威主義和精英民主的人士截然不同。

33 民主牆後民刊主要類型是地下刊物、以書代刊、經濟型報刊和境外刊物。以書代刊如《走向未來》和《新啟蒙》以及經濟型報刊如《經濟學週報》和《世界經濟導報》，可以藉助官方渠道印刷和發行。對 1978 至 1981 年民主牆的承繼主要是地下民刊以及境外民刊，如《中國之春》，境外刊物——包括香港出版的書刊——內容和議題更加自由，這些資料通過不同渠道傳回大陸。見任曉叮電郵採訪，2018 年 1 月 7 日至 8 日。也看 1988 年香港刊物《紀念民主牆運動十週年專輯》。

八十年代以書代刊以及經濟型報刊的民間出版可以通過官方渠道印刷和發行，民主牆的參與者和高校學生也在 1989 年初在北京高校等地散發民主牆紀念資料，《世界經濟導報》、《北京經濟學週

以後，異議和批評中共體制或號召行動的大小字報不時張貼在北京高校內部公共空間，直至 1989 年學潮爆發。³⁴ 在胡耀邦去世之後最初兩天，上千張大小字報出現在北京高校校園內，這是運動的輿論先導；隨後大小字報、傳單和刊物對運動的論述一直與運動相伴。六四屠殺之後的一週，北京城內和高校仍然有大小字報和傳單，記錄屠殺、抗議中共暴政以及號召全國罷課、罷工、罷市。1989 年運動中的傳單大規模出現在 4 月 20 日以後，一直持續存活到 1992 年。

有抗爭經驗的八九年民刊參與者對運動的策略動員和聯絡不同階層，發揮了重要作用。1949 年後中共建構等級社會的下層階層沉積了不斷清洗的知識人和知識青年。在毛時代，他們成為這些底層社會階層的一部分；在 1980 年代，倖存的知識人重新形成了有一定影響的知識階層，從事教育、文學、科技、社科、新聞等行業，直接影響青年學生和工人。高校許多教師有當農民、工人甚至士兵和公安的經歷，青年學生也來自廣泛的社會階層和族群，他們不少人有八十年代學運的經歷。運動期間，這些高校師生製作的民刊更容易與社會其他階層和族群建立聯繫，直接與這些社群對話和互動。

知識界四次接力公共信，要求釋放政治犯，是 1989 年最早的大小字報，這是重要的承前啟後擴展空間和打通境內外傳播渠道的努力。³⁵ 知識界和異議人士承續在 1989 年前挑戰專制的經驗，其後在於與高校學生中再次醞釀的五四運動 70 週年的學運聯繫起來。這四次公開信複印後，由高校學生在北大三角地和其他高校校園張貼，³⁶ 同時在香港雜誌刊登，傳回中國大陸，³⁷ 外台中文廣播也有相關報導。接力公共信成為 1989 年運動民刊製作的前奏，促成了

報》、《走向未來》、《新啟蒙》在運動中仍有編輯出版，直至被關閉。

34 1988 年 3 月後北大大字報出現的頻率增加，6 月學潮是大大字報高峰，這類大字報不少張貼在各高校。參看陳小雅（2019），〈1988 年的大字報〉。1988 年 3 月兩會期間，十幾名學生在人民大會堂靜坐和 6 月行動委員會，參看 1988 年 3 至 12 月《爭鳴》、《九十年代》、《前線》、《鏡報》。也參看 Pieke and Lambo (1990)，有官方摘錄的學生抗議大字報，收集方勵之和知識界公開信。筆者於當年 3 月看過鄧橄文小字報，這份小字報可見官方版本，中共研究雜誌社（1989：3），也參照邵江（2018）。

35 1989 年 2 月，方勵之撰寫了〈中國的希望和失望〉，中英文也有類似的傳播方式。

36 李淑嫻和王丹以電郵回憶方勵之公開信的傳播，2018 年 12 月 3 日至 5 日，其他三份接力公開信的傳播也類似。筆者也參與傳播這些公開信。

37 參看 1989 年 1 月至 4 月香港《九十年代》、《爭鳴》、《百姓》。

1989 年運動潛在參加者解讀中國政治和社會，尤其激發了年輕參與者探索官方屏蔽的歷史。這些接力公共信以大字報張貼和傳單散發，既可以測試傳播範圍，又可以觀察各階層對這些公共言說的回應。

1989 年直接參與遊行的數百所高校，學生 280 餘萬人次上街遊行，上百個城市、上千萬社會各界人士上街參與運動。³⁸ 運動期間，北京所有 35 所高校都參加了遊行。幾乎所有院校在運動初期的動員機制主要是大字報，而保持運動持續性、動員不同社會階層參與以及學生、市民和工人內部動員，傳單都發揮了重要作用。大字報、傳單、遊行標語和條幅、印刷刊物成為運動策略動員和聯絡社會各階層、族裔和不同代際的主要媒介。³⁹

運動初期以學生為先導的遊行示威，對社會策略動員初始體現在 4 月 18 日清晨人民大會堂前遊行靜坐時的〈七條〉。〈七條〉第一條重評胡耀邦，直接挑戰太上皇專權。第二條否定中共的「清除精神污染」與「反自由化」運動，獲得了異議知識人士的共鳴。第三條公布黨和國家領導人及其子女財產，這條要求直接反映了社會各界對腐敗、特權、官倒和世襲的不滿，直接與中國當下政治制度相關。第四條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和允許民間辦報，是對知識界在 1989 年初四封接力公開信的直接呼應，北京知識界很快公開支持學生運動。⁴⁰ 第五條取消北京人大常委會違反憲法而制定的限制遊行的〈十條〉，與 1986 至 1987 年學潮要求遊行示威權利的目標直接相關，與 1986 至 1987 年學運參加者共鳴。〈七條〉中「增加教育經費，提高知識分子待遇」，體現了運動初始參與者本階層視野局限和精英意識，是〈七條〉中的敗筆條款。⁴¹ 從校

38 參看張萬舒（2009）有關上街城市和人數的統計；也見吳仁華（2017）。

39 北大大字報初始動員在運動開始 415 至 418。北大籌委會成立後，從 421 開始，在宿舍樓散發傳單也是動員方式。其他大學和其他城市的遊行示威圖片見中共研究雜誌社（1989）。成都運動參看天安門民主運動資料彙編以及 Lim（2014）。亦參看香港記者協會（1989）、西鶴（2013）。

40 4 月 21 日〈知識界致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公開信〉，<http://www.cnd.org/HXWZ/ZK99/zk170.hz8.html>。

41 遊行靜坐七條有不同版本，主要內容一樣，只是第七條有所不同：對此次學生運動作出公開公正報導／直接選舉國家領導人／政府領導人對失職事件，公開檢討。最初起草和收集遊行靜坐共十一條，其它四條是修改憲法，取消四項基本原則；直接選舉人大代表和國家領導人；平抑物價；減輕農民負擔。第一條有比較多爭論，第二條提法有爭論，後二條缺少回應。在廣場徵集意見時，這四條要求未讀。18 日上午回到人大和北大學生貼出的大字報十條或七條，與十一條重合。我是十一條的起草人，〈七條〉的敗筆條款與我缺乏視野和能力有關，雖然有不少學生贊成

園到天安門遊行過程中討論和協商運動的要求和目標，以及如何提出這些要求，形成運動初期對參與者的直接動員。⁴²

運動初期動員策略和聯絡不同階層需要集合社會各界最關注的共識，包括明確主張和直接反對，以符合社會各界要求變革的願望。一部分人與運動倡導什麼和提出的替代方案有共鳴，更多數人知道何為不公正，應該反對什麼。〈七條〉除了敗筆條款，基本兼顧這兩類社會群體的基本訴求，成為運動初始對社會各界動員以及與其他城市運動參與者互動的重要話語。⁴³

抄寫的〈七條〉大字報放在人民大會堂前靜坐學生中間，直接與經過大會堂的各界人士對話，參與靜坐的學生通過廣場公用電話，告知北大物理系副教授李淑嫻學生靜坐消息和〈七條〉內容。李淑嫻是 1987 年獨立參選人，成功當選海淀區人大代表。她在北大三角地張貼大字報，通報北大学生在人民大會堂前靜坐，根據中國憲法第 41 條準備向人大常委會遞交請願書。⁴⁴〈七條〉大字報也張貼在三角地，不久油印的〈七條〉傳單也在北京和外地流傳。

4 月 18 日晚學生的接力靜坐從大會堂前轉移到新華門前，要求與政府領導人直接對話。⁴⁵ 在新華門前靜坐的學生在 4 月 20 日清晨被警察和武警暴力驅離，數名學生和市民被警察打傷之後，新成立的北大籌委會改寫了〈七條〉部分要求，將公正處理打人兇手作為〈七條〉的一個訴求。⁴⁶ 運動參與者持續冒雨遊行，以及連續 20 小時遊行靜坐參加胡耀邦追悼會，使〈七條〉廣為流傳，凸顯了政府不僅拒絕回應社會有強烈共鳴的抗議要求，而且也揭露了聲稱的人民政府使用暴力壓制這些要求。運動初期的論述擴展，使更多的群體和地

增加教育經費，提高知識分子待遇，但是我當時缺乏視野和能力來增加一條與民眾參與經濟決策有關的條款代替這條敗筆條款。

42 在遊行到天安門途中討論靜坐目的地和向誰提出要求，有三個選項，新華門、人民大會堂等，多數選擇人民大會堂。

43 各地在 4 月 18 日後遊行也有類似於〈七條〉要求。見吳仁華（2014：30、156-160）。

44 參看方勵之（2011）。

45 18 日晚學生和市民在紀念碑前討論〈七條〉內容以及與最高政府領導人對話。參見王超華（2019：238）。

46 北大籌委會改寫了遊行靜坐〈七條〉，見 <https://twitter.com/shaojiang/status/1119694112704299010>；政法大學的傳單也有類似要求，見 <https://twitter.com/shaojiang/status/1119670927388758016>。

域關注運動的要求，擴大了運動規模。⁴⁷

從 4 月 23 日到 25 日，與〈七條〉要求公布黨和國家領導人及家人財產相呼應，北京高校大字報和傳單集中揭露中國的專制制度、特權和世襲制是腐敗的根源。中共專制特權階層利用雙軌制、官倒走私牟取暴利、集團消費權錢交易，損害社會中下層的利益，壓榨人民；未經人民同意價格闖關，造成人民日常生活窘迫。〈香煙答記者問〉以幽默諷刺的問答聚焦了中國腐敗、制度、社會等級的根源問題。⁴⁸〈官倒內幕〉揭露中共官員和太子黨利用雙軌和批文牟取暴利。⁴⁹〈試看今日之中國竟是誰之天下〉和〈革命家譜錄〉歷數中共第一代領導人家人沒有獲得人民授權直接擔任黨政軍、產商學要職，太子黨包括李鵬、鄧樸方、習近平等來自近兩百個中共高層家庭。這些大字報油印成傳單在北京等地傳播，⁵⁰使社會各界增加對運動的關注，反思自己的處境，促成北京市民直接參與運動。

〈七條〉及其後續的民刊以集中要求與中共黨國最高層平等和公開對話作為運動的動員方式。官方的回應是與官方學生會對話，拒絕與學生自治會對話，以模糊承諾，阻止學生未來大規模上街。4 月 25 日，清華大學籌傳單和大字報揭露北京市政府提出與清華單獨對話。經過清華大學各班代表的表決，清華大學籌委會要求中央政府與北京高校全體同學對話，同時表決繼續罷課。⁵¹這份傳單再次清楚界定了保障平等對話的基本條件，即北京高校全體同學作為對話的一方，直接且平等地與中央政府對話，防止中共以對話為手段分化學生運動。

官方一方面以對話勸誘學生不要上街，同時又以《人民日報》〈四 二六社

47 見〈一份來自大街上的報告〉，收錄於《民運原資料精選》第二輯，98 頁。上海各高校內傳播北京 420 血案和 422 學生為參加胡耀邦追悼會遊行靜坐 20 小時，跪交七條，官方置之不理的消息。

48 見 <https://twitter.com/shaojiang/status/1121481866039705600>。

49 這些傳單揭露，截至 1984 年下半年，中共黨政軍幹部及子女利用放鬆控制和雙軌建立 20,000 家公司，不少是走私公司。即使在短暫的 1986 年治理，其趨勢並無改善。僅 1988 年一年就建立了 180,000 個這類公司，這些公司使用特權獲得批文、利用雙軌制、走私牟取暴利。

50 BL222-4。這幾份大字報在印成傳單時有不同題目和內容，如〈中共太子黨〉與〈革命家譜錄〉和〈試看今日之中國竟是誰之天下〉內容相似。〈官倒內幕〉揭露的內容，也參看 Lin, Bih-jaw, and Maria Hsia Chang (1992: 278)。

51 清華大字報〈關於 425 對話的真相〉，見 <https://twitter.com/shaojiang/status/1121469946066870272>。

論〉指責學生運動製造動亂，恐嚇學生上街遊行。北大學生在三角地張貼〈致全國各階層各界人士書〉，指出《人民日報》的〈四二六社論〉是有組織有預謀的壓制學生民主的呼聲，從運動開始，政府就拒絕與學生平等對話，利用新聞報導多次對學運肆意歪曲，對學運採取敵對態度。聲明呼籲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將民主運動進行到底！⁵² 民刊系統揭露官方腐敗、中共高層世襲和官倒，傳播運動訴求反映了其他社會階層的願望，直接動員了民眾。4月27日，北京高校學生抗議〈四二六社論〉，在高壓下上街遊行，北京數十萬市民上街幫助學生沖開警察和軍隊的阻擋，成功完成了環城遊行。⁵³

4月29日，官方主要選擇以官方學生會幹部作為主要對話對象，這些官方學生會幹部都未參加學潮，同時選擇個別學生自治會成員，意圖分裂學生獨立組織，在談話中又指責學生自治組織是非法組織（吳仁華：2014：187-8）。大量傳單、大字報和刊物揭露官方將學生要求的平等對話轉為訓話以平息輿論的批評，拖延公開、有實質內容的對話，並且拒絕與學生自治組織的對話。⁵⁴ 推動學生和政府平等和公開對話，成為調動社會各階層支持運動的方式。⁵⁵ 在運動中以對話推動政權的透明過程，進而揭示了中國當前制度中統治者和人民的關係，政府的統治沒有人民的授權，政府官員不是自稱的人民公僕。

自4月25日開始，對話成為許多民刊的主要論述內容。以往民刊很少有這方面的討論，將對話和制度專制作為公共議題，使更多民眾直接觀察和體會制度問題以及反省自身處境。民刊中要求政府平等對話和對話過程透明，而不是臣民的上訪請願，這是對4月22日學生下跪請願的反省和批評。在對話的

52 大字報傳單複印件請見 <https://twitter.com/shaojiang/status/1121824409185128448>。也看另一篇傳單〈大陸民主愛國運動與十年動亂〉。這份傳單也回應了〈四二六社論〉把八九民運比作文革動亂，闡明八九民運是人民自己爭取民主，而中共的文革是自上而下運動人民，以更專制的手段鎮壓人民。

53 427大遊行社會各界幫助學生遊行開路，參看陳小雅（2019）；427大遊行的重要意義參看王超華（2019：195-199）。幾個學生自治會和北高聯取消427遊行，但是多數學生決定遊行。

54 見 *The Archives of Democracy Movement*（未出版資料），第130-140頁。

55 知識界和新聞界最早聲援的紀錄，見 *The Archives of Democracy Movement*（未出版資料），第142、143、151至153頁。社會其他各界聲援的紀錄見 Pieke and Lamboo（1994），微縮膠片編號 PAM 00016、PAM 00017、PAM 00183。

內容和程序體現參與抗議的群體學生、知識界和新聞界的自主和獨立意志，而不是依照官方劃定的範圍和可控方式。

官方拒絕平等對話，選擇低層技術官員與官方學生會單獨對話，將運動要求的民主和改變制度，窄化為官方可控具體領域以及轉化為改善黨的領導，消耗運動能量，拖延時間，分裂學生運動。⁵⁶ 這階段運動的策略論述主要是堅持校園自治、罷課以及學生與政府的對話，⁵⁷ 但這類論述限制在學校空間內、局限於學生群體動員，主要參與階層仍然限於學生和知識界，⁵⁸ 而不是社會各階層的直接參與，運動陷於低谷期。北大大字報建議以對話成為運動的主要訴求，在戈爾巴喬夫訪華之前學生佔領廣場，開始絕食。⁵⁹ 學生集體絕食使運動升級，絕食期間大量傳單在校園、廣場、街道大範圍散發，形成更廣泛動員方式，社會各界聲援遊行成為運動的主要方式，⁶⁰ 佔領天安門廣場和周圍主要街道成為聯繫社會各界的主要空間。

〈絕食宣言〉以情感訴諸運動動員，⁶¹ 以自我犧牲的精神獲得社會更廣泛的關注。絕食開始後，學生、知識界大量印刷傳單揭露官方操控對話，無視學生的要求，學生迫不得已以生命為代價爭取民主。廣場集體絕食、標語和出版物形成公眾關注的聚焦點，社會各界上街聲援學生。5月17日，在李鵬與學生代表見面和電視轉播之前，中共握有軍隊實權者已經決定調動大規模軍隊進入北京鎮壓，宣布是維護首都社會秩序。傳單、大字報和刊物反駁官方的說法，指出北京沒有發生任何官方宣稱的動亂，而且自運動以來北京的犯罪率是近年最低的，這在戒嚴後進一步動員社會不同階層新的參與者有重要影響。傳單傳播要求人大開會討論戒嚴合法性問題，這些傳單廣泛動員社會各界直接反對軍管。

56 對官方組織 429「對話」的揭露，見人大、北大、北師大 4月30日至5月14日傳單，BL130-140。

57 1989年5月2日高自聯請願書，http://www.tiananmenuizhi.com/2015/05/198952_1.html。

58 5月10日學生支持新聞界要求新聞自由的遊行。

59 參看吳仁華（2014），也見 <https://twitter.com/wurenhua/status/68120920652394496>。

60 北京從15日到19日不完全統計有700多個單位遊行，高校、中專、技校、職業，中小學、新聞單位、文化部門、科研機構、中央、國家機關、北京市屬機關單位、民主黨派、宗教界、工廠、企業、商店、飯店、公司、醫院。參看國家教委思想政治司（1989：21）。

61 〈絕食宣言〉見 <https://twitter.com/shaojiang/status/1127657818482458624>。社會各界散發的傳單是不同版本的〈救救孩子〉，包括官媒也以這個主題報導絕食和百萬人遊行聲援絕食。

大字報和傳單維持校園運動能量，擴散城市各階層，而以上街和廣場作為聯絡和動員社會各界的方式。尤其是戒嚴以後到北京工廠等地的傳播，而最有挑戰的，是向戒嚴部隊官兵說明運動真相的傳單——民主運動是爭取所有人的民主權利，部隊官兵也是專制制度和腐敗的受害者，軍人應該與人民站到一起。⁶² 一些軍人將傳單帶入軍營，也有學生和市民在軍隊集結地和大軍區駐地散發。⁶³ 不少傳單呼籲軍人抗命、報導七上將發表聯名信反對武力鎮壓運動，⁶⁴ 這些傳單在北京各界流傳，鼓勵了各界的持續抗爭。⁶⁵ 北大教師退黨和學生退團，與中共黨員集體要求握有軍權的鄧小平、執行戒嚴的楊尚昆和李鵬辭職的大字報和傳單，動員了更多的社會階層和不同代際民眾抵抗戒嚴。⁶⁶

伍、創造中心不同群體的抵抗

1989年運動民刊根植於特定的群體，傳播聯絡不同群體。不同的民刊啟動自己社群的行動，形成多元行動。各高校民刊和廣場民刊聯繫城市階層形成了運動的中心。在戒嚴以後，民刊策略性動員社會各階層，主要在廣場催生了更多社會階層的自治組織，形成以廣場為中心的多元行動。

1989年3月，中共當局鎮壓了拉薩的抗議活動，宣布對拉薩實施戒嚴。拉薩已經被鎮壓的抗議與北京被壓制的抗議，通過中央民院藏族學生在北京戒嚴後第三天（5月22日）的遊行標語，揭示了這兩起運動的關聯。⁶⁷ 中央民院系列傳單討論了藏族、維吾爾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的處境，探索民主、人權、自由、平等和民族自治的關係，通過校園自治、遊行、靜坐、絕食、佔領廣場和

62 參看北大傳單〈民主意味什麼〉。系列傳單告解放軍官兵書，見 *Selection of Source Documents from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未出版資料），第206至212頁。

63 散發傳單內容見《民運原資料精選》V1：20、40。

64 聯繫七上將簽名的羅點點也被捕。

65 《經濟學週報》的編輯也參與聯絡這些軍隊將領。

66 參看《民運原資料精選》V2，〈農民的呼聲政府意識到沒有〉（63頁），〈告黨員書〉（86、87–89頁）。系列傳單告解放軍官兵書，見 *Selection of Source Documents from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未出版資料），第206–212頁。

67 參看中央民族學院戒嚴後的遊行標語。5月22日，藏人學生的標語牌〈藏族人民反對軍管〉。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E6%B0%91%E4%B8%BB%E8%83%BD%E5%90%A6%E7%95%B6%E9%A3%AF%E5%90%83+30%E5%B9%B4%E5%89%8D%E5%A4%A9%E5%AE%89%E9%96%80%E5%82%B3%E5%96%AE%E5%B7%B2%E6%9C%89%E7%AD%94%E6%A1%88-DyVX6W>。

反抗戒嚴，實踐民主和自治的權利。⁶⁸

1989 年 4 月到 6 月運動中出現兩種主要類型的民刊：系列傳單和刊物。以地點劃分，主要是在校園和廣場，從運動醞釀期一直持續到六四屠殺後的校園出版系列傳單和刊物，形成了學生和知識界的抵抗中心；運動中後期廣場出版的系列傳單，形成了運動中心不同群體的抵抗。在運動中後期校園和廣場出版物的論述，也形成了不同群體的共同行動。在絕食期間和戒嚴期間，天安門廣場有三種系列傳單和刊物。《絕食快訊》以廣場紀念碑附近作為製作基地，動員學生和其他各界支持學運；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北京工自）系列印刷品在天安門西側觀禮台發散，動員工人和市民參與運動；首都知識界和各界聯合會的《新聞快訊》主要也在廣場紀念碑附近製作，是各界交流抵抗戒嚴的平台。

《絕食快訊》由北師大學生和劉曉波在廣場募捐購買印刷設備，進行編輯和印刷，並於 5 月 15 日在廣場散發，同時，也在廣場外使用國際直撥長途電話和電傳擴散。⁶⁹ 在創辦的最初兩天使用《北師大絕食團通訊》和《絕食快訊》名稱油印傳單，自 5 月 17 日後，在多數時間則使用《絕食快訊》。《絕食快訊》是最早出現、出版頻率最快和出版時間最長的廣場刊物和系列傳單，在大部分時間保持 24 小時連續印刷，從 5 月 15 日到 23 日每天出版至少 10 期，5 月 24 日到 6 月 3 日，每天也出版 3 至 4 期左右。這份刊物報導了學生絕食和靜坐的即時動態，以及發布對運動中重大事件的評論，動員各界及時聲援廣場學生。

首都工人、海洋石油職工和城建工人落款的傳單，從 5 月 17 日開始印

68 中央民院藏人大學生 5 月 22 日和 5 月 30 日在北京的遊行標語，見 <https://twitter.com/shaojiang/status/605478519909543939>；中央民院維吾爾大學生遊行，見 <https://twitter.com/shaojiang/status/1124620799892238337> 以及 <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905190074.aspx>。八十年代中後期，西藏的抗議一直不斷，參看 Tsering (1999)。更早的維吾爾學生運動發生在 1985 年 12 月 12 日的烏魯木齊，要求完全落實自治政策、民主選舉自治區官員、停止在維吾爾自治區的核試驗、停止向維吾爾自治區遣送犯人、停止少數民族的計劃生育，保護環境。參看伊利夏提 (2010, 2019)。穆斯林 5 月在天安門遊行，也將穆斯林關注的民族平等、宗教信仰自由、文化權利等，帶入公眾視野。參看 Gladney (1996: xxxii)。

69 劉曉波回憶《絕食快訊》自 15 日開始出版，結束日期大約 6 月 2 日，參見劉曉波 (1992: 129-30)。也見陳章寶回憶 (2018 年 11 月 20 日和 2019 年 1 月 13 日)。

刷，這是北京工人嘗試從基層工作場所參與運動。兩天後，北京工自聯系列印刷品在廣場和周圍傳播，號召戒嚴第一天發動 24 小時罷工，同時號召全國工人團結起來，成立自己的自治會，爭取民主。⁷⁰ 工自聯宣傳部的印刷中心和廣播站設在天安門西觀禮台，形成廣場人群聚集和流動的另一個中心，這也是北京工人和市民抗議軍管的主要聯絡和信息交流地點。⁷¹ 工自聯系列傳單號召召開人大、取消軍管、罷免李鵬，同時向戒嚴部隊士兵傳播，說明民主運動的目標和真相。北京工人印刷的系列傳單對運動後期在北京地區社會各界的罷工和怠工有重要影響。

工自聯 6 月 2 日和 3 日的傳單記錄了北京大屠殺前夕軍隊動態，並號召工人和市民共同抵抗即將來臨的鎮壓。6 月 2 日傳單主要內容是：「午夜武警車在木樨地撞死行人」，消息口耳相傳、傳單散發並通過工自聯廣播後，從子夜開始民眾在街頭攔下試圖進入市區的大量軍車和軍人。工自聯 6 月 3 日下午傳單內容：「軍隊攜帶武器闖入市區以及武警對民眾使用催淚瓦斯鎮壓民眾，號召民眾抵抗」。工自聯最後印出的傳單呼籲北京工人和市民在 6 月 3 日中午以後阻擋軍隊進城，許多人從 6 月 3 日午後再次在進入天安門廣場的各路口聚集，勸阻戒嚴部隊士兵離開市區、不要開槍和清場；在天安門廣場血腥清場後，仍有不少人在街頭向戒嚴部隊士兵述說屠殺真相。工自聯印刷傳單一直堅持到 6 月 3 日晚上軍隊開始鎮壓，未能印出的傳單在 6 月 4 日早晨軍隊清場後被帶出，由北大重印，與六四系列傳單廣泛傳播，動員北京各界，譴責屠殺以及反抗暴政。

四月學潮開始不久，知識界開始獨立印刷傳單與社會各界互動。同時，異議知識人士也在出版的官方報刊中報導民主運動，尤其在《世界經濟導報》被封後，新聞界和知識界出版系列傳單，公佈官方報刊檢查的文稿。5 月上旬開始，一些官媒記者也組織集會抗議箝制對運動的報導，爭取新聞自由。這些官媒新聞記者在絕食期間大量報導運動消息，不少文章在官方報刊出版。戒嚴期

70 這些系列印刷品強調工自聯是不受其他組織控制的工人自治組織，宗旨是摧毀專制和獨裁，推進民主化；在各類所有制企業中保護工人權益。參看《民運原資料精選》V1：26-32。

71 《民運原資料精選》V1：26-32。也參看李進進（1999）和趙常青（2010）。

間，官媒報導再次收緊，一些記者直接印刷被禁的文章，以傳單方式傳播。⁷² 官媒禁止出版的文章也出現在運動民刊中，有時在多個民刊中轉載。人大傳單和《新聞快訊》都轉載了被官方禁印的文章〈新聞要有說真話的勇氣〉。⁷³

知識界和新聞界在廣場創辦《新聞快訊》，成為知識界重要的抗議陣地。這份快訊的主要編輯者，是 1989 年初北京知識界接力公開信的參與者和組織者，如包遵信。⁷⁴ 在運動爆發後，他們組織知識界聲援學生運動，在新聞界串聯要求和實踐新聞自由。在戒嚴後，《新聞快訊》是社會各界聯絡的平台，動員各界上街遊行抗議軍管，要求召開人大，取消戒嚴。5 月下旬，許多民眾從《新聞快訊》傳單獲知參與抗議的工人和市民被捕和面臨審判後，在北京公安局和石景山法院前聚集，要求立即釋放被捕示威人士。⁷⁵ 6 月 2 日，《新聞快訊》傳單報導四君子絕食消息和大量傳播了〈絕食宣言〉。

1989 年運動期間，北京約 20 所高校校園雜誌和系列傳單在運動的各個階段，持續作為動員各界的聯絡中心。這些校園雜誌和系列傳單由學生自治會、北高聯或獨立於校方的師生編印。這些校園雜誌和系列傳單主要包括行動建議、圍繞運動的大事件發表聲明、活動預報和記錄社會各界的行動。高校系列傳單討論敏感的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議題，也轉載其他地區運動新聞和評論，同時聲援和報導其他地區被壓制的示威。這些傳單也傳遞缺乏發聲渠道的社會群體——如農民——支持運動的消息，以及在邊遠地區運動的消息。校園民刊也登載世界各地與運動有關的消息，包括聲援大陸民主運動的海外遊行和示威。校園民刊推動校園自治和全國高校串聯，形成了最基層的抵抗中心。

1989 年 5 月中旬以後，天安門廣場刊物和系列傳單，以及校園系列傳單和刊物大量出版，尤其是傳單與以往民刊形式的結合，對官方指控的反擊和回應更為有效和迅捷，並催生了在廣場的民間自治組織，如工自聯、知識界聯合會、外高聯、市民自治會、市民敢死隊、飛虎隊、各界聯席會等。同時這些

72 見《人民日報號外》，以及參看吳學燦（1997）和亞依（1996）。

73 在人大傳單（BL 76）和《新聞快訊》第五期都印刷這篇文章。

74 包遵信為《走向未來》主編，這套叢書對年輕人思維方式影響很大。

75 被捕工人和市民沈銀漢、錢玉明、向東平、易京瑤狀況的傳單，除了《新聞快訊》報導外，工自聯傳單、北高聯、北大傳單和各界聯席會議傳單都有刊載。

組織與自己社群人士聯絡和互動，學生、工人、農民、醫護人員、科教文化人士、官媒記者、企業家、宗教人士、中共黨國機關工作人員、甚至警察和軍人反抗專制形成串聯、怠工、傳遞消息、上街聲援、向戒嚴部隊說明北京狀況等抗議行動。支持協調這些多元行動主要是依靠高校民刊、工人自治會和首都各界聯合會印刷和傳播資料，跨界串聯，在運動中擴展空間，促成更多人參與運動。

北京高校和工人的系列傳單記錄了從 6 月 3 日晚到 6 月 5 日軍隊暴力進入北京城屠殺示威者和平民、死亡人數和部分受難者死亡情況；號召全國罷工、罷課、罷市，在各地悼念死難者。這些傳單是六四屠殺後最主要的民間傳媒，隨學生、工人離開北京在其他城市傳播。這類傳單成為民間紀念六四和未來數十年民間重要的抵抗形式。⁷⁶

陸、經驗和借鑒

1989 年民刊在開闢運動空間、傳播和論辯運動重要理念、策略論述、保持運動動員、聯絡社會階層、創造運動中心、形成不同群體抵抗行動等，發揮了重要作用。1989 年運動民刊是研究在中共黨國極權嚴密控制下，如何進行大規模跨階層動員和進行變革運動的重要資源；可溯源和辨析變革的理念、路徑和實踐，同時也為未來運動提供借鑒。1989 年運動民刊主要的經驗和教訓有以下四個方面：初期訴求未能發展成為各階層廣泛討論和認同貫穿整個運動的綱領；沒有突破同類單一空間作為抵抗中心的論述，而除了學生組織外，未能以對話和運動動員為切入點，建立社會各界和各族裔的基層自治組織；欠缺以具有革命性的理念辨析如愛國主義和民主以及法治與主權在民的關係；欠缺對全面民主的論述，以此實踐基層自治組織的全面民主。

民刊中有不少深入探討民主的論述。這些論述需要成為運動的有機組成，最直接的方式是與運動的綱領結合，但是這些論述未能結合運動初期的〈七

76 目前發現系列傳單包括五份北大傳單〈6.3 慘案〉、〈6 月 4 日緊急呼籲〉、〈告全世界同胞書〉、〈宣傳部快訊〉、〈記住吧！六月四日這黑暗的一天〉，北農大〈血的見證〉(BL 174.1)、匿名或化名的〈北京最近見聞錄〉，中國人權同盟〈告全國人民書〉，清華大學油印的英文傳單，這些六四傳單直接在北京和主要城市散發，傳真到香港和海外。

條〉，與各界交流發展成為貫穿民主運動的全民綱領。從4月18日到22日官方一直拒絕回復〈七條〉的要求，這時學生應該放棄請願方式，以〈七條〉與北京社會各界交流，消除學生和知識界的精英意識，超越本階層的局限，在各界反饋過程中形成全民運動綱領。⁷⁷ 在北京市民介入4月27日環城大遊行後，從4月28日到5月13日，運動主體仍然是學生和新聞界，民刊沒有以〈中共太子黨〉、〈試看今日之中國竟是誰之天下〉、〈官倒內幕〉等發展，也沒有集中論述中共黨國和全國人大都不代表工農和其他人民的利益，反而是奴役和剝削人民的特權專制統治者。人民需要建立自己的基層自治組織，各社群應該串聯交流、相互支持、持續擴展運動，從政治、經濟、社會生活、文化上爭取全面自治，實踐主權在民，⁷⁸ 探索變革制度和社會的路徑。

民刊除了未集中和持續論述運動綱領，在初始三十多天的論述也沒有突破同類單一空間為抵抗中心（主要是校園和廣場為中心）的論述。運動後期一些傳單拘泥於佔領中共重塑北京中心，如天安門廣場，一些傳單過分強調和依賴對這個中心的佔領、以及與中共爭奪天安門廣場的意義。除了高校學生和以廣場為依託的自治群體，在運動中未形成廣泛社會階層、以基層自治組織運動的多元中心。⁷⁹ 這與民刊論述理念的盲點，以及欠缺深入討論的重要議題有關，尤其與下面三個議題有關：基於分析黨國體制進行全面社群動員的整體戰略；論述政治和經濟民主的關係；社會各界基層實踐自治的重要性，成為運動中有影響力的論述。

1989年運動中，少量民刊辨析中共黨國政治經濟體制的政治專制和經濟控制，界定中共標榜的公有制不是人人所有，而是官僚所有制，其實質是特權經濟和官有制，經濟運行的每一細節，都不得不付給各級官員巨額非法報

77 中國國家領導人和全國人大代表都不是由全民公正直接選舉出來的。初始的請願地點將人民大會堂和新華門這類衙門轉為公共空間，但是創造公共空間不是運動的唯一目標，更重要是通過遊行、靜坐等揭露黨國體制的問題，直接與社會各界交流，形成各界有共識的運動綱領。

78 曹思源和王超華在六四後都提出主權在民和人民主權，這本來可以成為八九運動綱領的主要論述，這種論述出現在八九年民刊〈共和國不是私有財產〉和一些工人傳單中，但這類論述過分零散。六四後曹思源將主權在民放入修改《憲法》議程，王超華（2019：58-63）論述的人民主權涉及更廣泛的場域。參看曹思源（2014）。

79 戒嚴以後才開始出現呼籲建立基層自治組織的傳單，但是數量太少，論述內容欠缺不少。

酬。⁸⁰ 但這類論述數量非常少，未成為運動論述的主流。運動中，多數學生參與者對於基層民眾廣泛不滿這種官僚制度的心理缺乏足夠的認識，而基層民眾的這種認知和對運動各界廣泛贊同綱領的共鳴，完全可以促成建立各社群基層自治組織或抵抗網絡。⁸¹

八九年民刊也未深入討論社會各階層如何發揮主體性以結束官僚所有制，使經濟也控制在自治或民主的機制下。這種話語和論述的稀少或缺失也反映了社會動員戰略上的盲點，運動初期直接動員的〈七條〉欠缺這些內容。尤其在427遊行後包括五四70週年遊行，⁸² 未能藉全民運動發軔之際，以經濟民主和政治民主開展對社會各界基層的動員，論述各界建立基層自治組織，包括工自聯、農自聯，⁸³ 和其他階層基層自治會的必要性，並開始基層經濟民主和政治民主的實踐。從戒嚴開始到六四屠殺以後，基層自治組織的匱乏，使從街頭抵抗或地下抵抗未能轉化為全國範圍多中心、全方位的抵抗，從政治、經濟和文化上全面瓦解中共專制的統治基礎，包括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的抵抗；持續的罷工、罷課、罷市、抗稅，切斷官方電視或電台信號，或直接使用官方頻道插播運動民刊，更未能形成社會各階層之間有網絡的政治支持、經濟互助；

80 〈腐化的根源是虛假的公有製〉，見《中國民運原資料精選》V.2：170，這與1986年的〈青年馬克思主義宣言〉看法相同。後期傳單也有指出，中共是無所不在壓榨和束縛人民的官僚專制集團。〈青年馬克思主義宣言〉進一步號召青年學生以民主宣傳影響社會各階層，通過工運、農運、策反軍隊結束中共統治。這類如〈青年馬克思主義宣言〉的論述沒有成為1989年有影響的論述與缺乏傳播有關。八十年代後期知識界的以改革輿論影響官方的論述成為主流，但這類論述未說明社會群體如學生、工人、農民如何發揮自己的主體性爭取民主。〈青年馬克思主義宣言〉未能獲得知識界重視的另一個原因是，以馬克思的思想分析中共體制已經不受歡迎，〈青年馬克思主義宣言〉只在他的幾個同學中傳播，作者被捕後學生和知識界最多將這個事件作為言論自由被壓制的實例，而忽略這個宣言的內容。時至今日，在作者去世後仍然沒有發〈青年馬克思主義宣言〉的原始完整版本。

81 八十年代中後期，北京師範學院畢業生張中天在河南農村組織農民反抗基層官員打白條，表明完全可以發動農民，在基層建立自治會。張中天在1988年被判刑十年，參見（陸祀：2004）。可惜張中天的努力很少為1989年運動參與者所知。也見王超華（2019：164）提出工人為什麼沒有發動起來也與缺乏這個論述（官僚所有制）有關。

82 427大遊行，社會各界幫助學生遊行開路，參看：http://blog.bnn.co/hero/201705/yanjiaqi99/10_18.shtml。427大遊行是全民運動的起點，參看王超華（2019：195–199）。幾個學生自治會和北高聯取消427遊行，但是多數學生決定遊行。遊行成功後，未能及時在社會各界對運動有高度期待時論述社會各界自治。

83 八九年工人有意識區別工自聯和工會。工自聯是工人自己組織的組織，工會是指官方工會。見《民運原資料精選》V1：26–32。

同時建立獨立於黨國的教育和文化，為年輕世代提供有辯駁和批評的思維方法。社會動員戰略的盲點也表現在戒嚴之後才開始動員工人、聯絡軍人，而不是從 420 血案後立即開始聯繫解放軍和武警官兵，⁸⁴ 準備軍事策反，也應在 422 後立即聯絡、動員工人與其他社會各階層。

1989 年運動民刊也未充分辨析中共宣稱的社會主義，沒有民主的所謂社會主義制度只能是極權官僚政治經濟制度。大部分民刊對中共宣稱 1949 年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實驗缺乏辯駁，民刊說明了中共在 1949 年後沒有民主造成的災難，但沒有進一步說明人民被強迫成為中共非人化或異化的試驗品，⁸⁵ 更缺乏前瞻性論述中共以商品經濟（後來使用市場經濟）、利潤、金錢為經濟改革目標，是既加深對人民的奴役和剝削，又對人民進行徹底物化；人民有權利拒絕自己被異化和物化，有權利拒絕被異化和物化的實驗，有權利自決探索和實踐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

1989 年民刊討論民主本身的意義，沒有民主必然導致上層權力腐敗和官僚腐敗，沒有民主的經濟改革和發展只是有利於權貴，人民無法擺脫被奴役的狀態。一些民刊提出了民主既有政治民主又包括經濟民主，但是這些民刊未提出在運動中如何實踐這些理念，沒有清晰辯駁與政治民主匹配的經濟制度不是資本主義（邵江，2019），爭取政治和經濟民主必然需要防止極權對人的異化，同時防止資本和市場對人的物化。

八九民刊對民主與法治的關係也未深入探討與人民主權的關係，法律由人民參與制定，人民沒有參與制定的法律便沒有統治人民的權威，人民自然也有藐視這類權威和抵抗這類法律的權利。缺失民主與法治基本原則，以及爭取經濟民主的論述，導致反抗手段的單一。這也影響後八九時代的民間抵抗，與官方壓制手段更新和強化相比，反抗理念的盲點、手段匱乏導致的無力感，以及放棄抵抗的犬儒主義逐漸盛行。在當今的中國，政治與經濟民主以及法治與

84 許多學生在 1989 年前參加過軍訓，一些學生與士兵和低層軍官保持聯繫。北京戒嚴前十天，高校傳單進入軍隊。但是策反軍隊需要通過與士兵和低層軍官建立長期網絡，持續傳播。〈青年馬克思主義宣言〉在 1986 年底就提出策反軍隊，但對 1989 年參與者影響甚微。

85 人的異化是中國八十年代的重要議題，從異化介入論述可以使許多人有所共鳴。參看崔衛平（2008）。

民主的論述，仍然需要繼續八九運動民刊未完成的旅程，抵抗運動才能走出困境。

八九運動傳單反擊官方將運動定為動亂，一些參與者主張爭取民主，同時強調愛國，如傳單〈我們發起這場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愛國民主運動的原因是〉將運動定義為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愛國運動，甚至有參與者將中華富強視為民主的目標，將民主與國族的建構聯繫起來。將民主運動的合法性建立在是否愛國的論述，可以溯源於中共界定五四運動只是愛國民主運動的單一版本對參與者的影響。八九民刊缺乏對官方歷史敘事的辨析和批判，極少反思愛國主義與中華帝國主義的關係。後八九時代這種傾向更為嚴重，許多中國知識界人士更缺乏對中共以國族主義、愛國和強國、主權建構的帝國意識形態的批判，一些更是替中華帝國謀。

全面制度和社會變革運動，基於參與者在運動期間有視野和遠見的論述和動員，促成各個階層參與，而不能只依靠一個社會群體擴展運動，需要有不同的群體共同擴展。八九運動多數學生參與者尤其在運動高峰期間，沒有充分意識到統治者一直有效控制軍隊，官方媒體尚能有效運作，影響許多被蒙蔽的民眾，暴力鎮壓隨時發生。在這種情況下，運動升級的方式恰恰不是依靠已有佔領，不是將爭取民主的論述轉化為保衛天安門的論述，不是持續消耗已經覺醒民眾的熱情、要求這些民眾保衛所謂畢其功於一役天安門廣場的論述，⁸⁶而是需要系統分析論述中共專制體制始終奴役人民，民眾需要基層的抵抗和動員。⁸⁷ 社會各界基層實踐民主和公民權利創造的多中心，最可能防止鎮壓一個中心後，導致整個運動失去了依託。非同類多中心抵抗，不僅可以延長抵抗時間，而且全方位、最大程度消耗統治者的資源。這種抵抗可以保護和聚集運動參與者的熱情，爭取更多人的支持，這種長期和持續有規模的抵抗可以觸發內外環境，有利於社會和制度朝根本變革的方向發展。

1989年運動後期民刊號召各階層自治，但很少論述在中共控制的單位體制中，參與者如何自主在工作場所實踐民主。一些民刊論及爭取民主可以是人

86 5月28日後不少傳單強調天安門是運動的旗幟、保衛天安門廣場。

87 在89年，這類傳單主要出現在戒嚴後，但是對如何實踐主權論述不足。

民參與經濟決策，但是這種論述沒有說明如何讓農民和工人在田野、工廠等場所實踐經濟民主，這些階層如何從基層自治實踐民主。⁸⁸ 運動對話論述創造了 1978 年民主牆以及 1989 年後被嚴厲壓制的維權運動所沒有的公共場域，但是大量民刊只有學生和新聞界自己與官方對話的論述，而沒有論述其他社會各界、各族裔應該使用對話話語建立自己的基層自治和民族自治組織。由於缺乏這些論述，廣場集體絕食再次成為以學生為主的運動動員方式，雖然贏得了社會各界的迅速聲援，但是社會各界和各民族很難從基層解除中共的控制。

八九運動民刊對後八九民間社會抵抗仍有極大的借鑒作用。異議人士與其他被壓迫階層的聯合，組織獨立工會和反對黨。劉曉波對獨裁愛國／民族主義的批判，參與起草《零八憲章》，嘗試超越 1989 年運動民刊的論述。年輕大學生和勞工人士聯合爭取工人權利的勞工運動。女權運動反抗父權與專制結合的中國政治制度，爭取性別平等。新公民運動以爭取城鄉居民平等和教育平權為目標。天安門母親群體尋訪和調查六四死難者、要求對六四屠殺進行獨立和公正的調查、追責和賠償，是後 1989 年民間抵抗、尋求轉型正義的重要起點。六四後的民間運動需要借鑑 1989 年民刊的經驗，在不同性別、社群、世代和族群之間建立對話空間，尋找共識論述，建立這些群體的基層自治組織或網絡，尋找和發動有韌性和持續擴大的抵抗，這是結束極權和帝國、尋求人的解放運動不能迴避的問題。

1989 年民主運動已經三十週年，中共從天安門屠殺中建立以高技術結合傳統極權機制的維穩體系，對外以專制、帝國和資本主義結合的方式向世界輸出中國模式，從區域極權帝國擴張為世界範圍的霸權極權帝國。在全球資本主義時代，中共以資本擴張匹配專制減損民主，這種全球模式更加深了民主的危機（邵江，2019）。中華帝國以快速發展經濟和迅速擴張，建立了全球專制和

88 感謝白夏（Jean-Philippe Béja）在六四事件 30 週年研討會對比和評論 1989 年運動和民主牆運動，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rKb3CAyuv4>，1:07:3 到 1:07:32。1989 年運動超越 1978 至 1980 年民主牆運動的觀念，1989 年的運動是自治、對話和經濟民主，民主牆運動側重論述宏觀制度的變革、以及「制度應該是什麼」。1989 年運動不僅繼續民主牆，論述「制度是什麼」，而且強調如何從社會內部改變，及社會各界自己從觀念到實踐的改變。關於自治，除了學生，可惜這些觀念沒有及時、全面和持續在社會其他各階層的基層實施；對話在運動中未能直接與社會各界交流發展成為貫穿民主運動的全民綱領；經濟民主未能成為基層自治的動力和實踐的核心內容。這些經驗為未來變革提供重要借鑒。

資本財團的反民主精英聯盟，其中包括民主國家內部官產學媒精英人士。面對中國極權和帝國結合的全球擴張，建立在基層的跨社群、族裔、性別、代際共同抵抗尤為重要；任何地方都可能成為抵抗極權帝國的前沿，抓住不同地區的抵抗時機，積累抵抗的網絡和動能，跨國境和區域共同抵抗，推翻全球反民主精英集團建構的世界秩序，促成全球根本性變革。

1989年民刊對當下最重要的借鑒是爭取全面民主，包括爭取經濟民主、社會民主和政治民主，反對腐敗和追求社會公正，爭取公民的所有權利包括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在全球資本主義下，面對專制極權、官僚資本和帝國主義的合謀，全球抵抗更需要運動論述，既反抗全球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又反抗專制和極權。

參考文獻

- Bondanella, Peter. 1997. *Umberto Eco and the Open Text: Semiotics, Fiction, Popular Cultu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inancial Times. 2019. "Beijing Ramps Up Crackdown on Labour Activist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ft.com/content/afc34a7e-513c-11e9-b401-8d9ef1626294>.
- Francis, Corinna-Barbara. 1989. "The Progress of Protest in China: The Spring of 1989," *Asian Survey* 29(9): 898-915.
- Gladney, Dru C. 1996. *Muslim Chinese: Ethnic Nationalis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Cambridge, MA: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 Johnson, Sammie and Patricia Prijatel. 2006. *The Magazine from Cover to Cov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im, Louisa. 2014. "After 25 Years Of Amnesia, Remembering A Forgotten Tiananmen," achieved from <https://www.npr.org/2014/04/15/301433547/after-25-years-of-amnesia-remembering-a-forgotten-tiananmen>.
- Lin, Bih-jaw, and Maria Hsia Chang. 1992. *The Aftermath of the 1989 Tiananmen Crisis in Mainland China*.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 Pieke, Frank N. and Fons Lamboo. 1990. *Inventory of the Collection Chinese Peoples Movement, Spring 1989—Vol I*. Amsterdam: Stichting Beheer IISG.
- _____. 1991. *Inventory of the Collection Chinese Peoples Movement, Spring 1989—Vol II: Audiovisual materials, objects and newspapers*. Amsterdam: Stichting Beheer IISG.
- _____. 1994. *Inventory of the Collection Chinese Peoples Movement, Spring 1989—Vol III: Guide to the Microform Collection*. Leiden: IDC.

- Shakya, Tsering. 1999. *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Since 194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Shao, Jiang. 2015. *Citizen Publications in China before the Internet*.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 Wasserstrom, Jeffrey N. and Elizabeth Perry. 1992. *Popular Protest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Modern China*.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 Wu, Hung. 2005. *Remaking Beijing: Tiananmen Square and the Creation of a Political Space*. London: Reaktion.
- Yu, P.K. et al. 1970.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during the Late Ch'ing: A Guide to Chinese Periodicals*. Washington, DC: Centre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
- Zhao, Dingxin. 2000. "State Society Relations and the Discourses and Activities of 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5(6): 1592-632.
- [Unpublished Material] *Selection of Source Documents from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Vol. 1, 2, 3).
- 十月評論編輯委員會。1989a。《中國民運原資料精選（第一輯）》。十月評論社。
- _____。1989b。《中國民運原資料精選（第二輯）》。十月評論社。
- 中共研究雜誌社。1989。《火與血之真相：中國大陸民主運動紀實》。中共研究雜誌社。
- 戈公振。2011。《中國報學史》。上海：三聯書店。
- 方平。2004。〈清末上海民間報刊與公眾輿論的表達模式〉，取自 [http://www.cuhk.edu.hk/ics/21c/media/articles/c063-200012001 .pdf](http://www.cuhk.edu.hk/ics/21c/media/articles/c063-200012001.pdf)。
- 方勵之。2011。〈我經歷的 1989-1990 中美互動（A）〉，取自 <http://fang-lizhi.hxwk.org/2011/05/29/%e6%88%91%e7%bb%8f%e5%8e%86%e7%9a%841989-1990%e4%b8%ad%e7%be%8e%e4%ba%92%e5%8a%a8%ef%bc%88a%ef%bc%89/>。
- _____。2012。〈一九八九爆發前夜的故事〉，取自 <http://hx.cnd.org/2012/04/26/%E6%96%B9%E5%8A%B1%E4%B9%8B%EF%BC%88%E9%81%97%E4%BD%9C%EF%BC%89%EF%BC%9A%E4%B8%80%E4%B9%9D%E5%85%AB%E4%B9%9D%E7%88%86%E5%8F%91%E5%89%8D%E5%A4%9C%E7%9A%84%E6%95%85%E4%BA%8B/>。
- 王超華。2019《從來就沒有救世主：六四 30 週年祭》。台灣：渠成文化。
- 包遵信。1997。《六四的內情：未完成的涅槃》。風雲時代。
- 本雅明著，王才勇譯。2002。《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中國城市出版社。
- 任曉町。1979。〈中國人權宣言 19 條〉，取自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396255>。
- 伊利夏提。2010。〈嚴冬裡的自由呼聲〉，取自 <http://forum.uyghuramerican.org/forum/showthread.php?23010-%2525E4%2525B8%2525A5%2525E5%252586%2525AC%2>

525E9%252587%25258C%2525E7%25259A%252584%2525E8%252587%2525AA%2525E7%252594%2525B1%2525E5%252591%2525BC%2525E5%2525A3%2525B0-%2525E4%2525BC%25258A%2525E5%252588%2525A9%2525E5%2525A4%25258F%2525E6%25258F%252590。

_____。2019。〈解讀新疆：維吾爾人看天安門事件〉，取自 <https://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jieduxinjiang/xj-05302019215641.html>。

西鶴。2013。〈一九八九年春夏復旦大學及上海市民主運動目睹記——披露我當年的一段日記〉，取自 https://1989bbs.blogspot.com/2013/06/blog-post_8649.html。

吳仁華。2014。《六四事件全程實錄》。真相出版社。

_____。2017。〈天安門事件大事記：6月9日星期五〉，取自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82449>。

吳學燦。1997。〈刻骨銘心終身難忘——寫給「六·四」八週年紀念日大遊行和對話會〉，取自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5/09/blog-post_830.html。

李進進。1999。〈記第一個工人自治組織——北京工自聯〉，取自 https://blog.boxun.com/hero/2007/gongziliang/2_1.shtml。

亞依。1996。〈以生命向專制挑戰——訪原《人民日報》海外版編輯吳學燦〉，取自 <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10/170/109201574250.htm>。

佳士工人聲援團官網。2018。〈賀鵬超——那隻翱翔天空的雄鷹：翱翔藍天，浩志長存〉，取自 <https://xunzhaoshiliantongzhi.github.io/hypc/>。

邵江。2018。〈我所經歷的學運和 89 年民主運動〉，取自 <https://shaojiang1989.blogspot.com/2018/12/89.html>。

_____。2019。〈全球資本主義時代下民主的危機〉。《台灣國際研究季刊》15(1)：173-99。

俞梅蓀。2013。〈全國人大常委會行使委員權力第一人——社會危機時刻的智勇者胡績偉週年祭〉，取自 <http://biweeklyarchive.hrichina.org/article/11479.html>。

胡適。1929。〈人權與約法〉，取自 [https://www.readingtimes.com.tw/ReadingTimes/ProductPage.aspx?gp=productdetail&cid=mcbb\(SellItems\)&id=WJPC0552&p=excerpt&exid=45903](https://www.readingtimes.com.tw/ReadingTimes/ProductPage.aspx?gp=productdetail&cid=mcbb(SellItems)&id=WJPC0552&p=excerpt&exid=45903)。

苒苒。2018。〈中國左翼青年的崛起和官方的打壓〉。BBC News 中文網。取自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46616052>。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1991。《八九中國民運資料冊》，取自 <https://www.64memo.com/b5/6.htm>。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2014。《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我們在北京——中大學生八九民運見證》。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

香港記者協會。1989。《人民不會忘記——八九民運實錄人民軍隊向人民開槍》。香港記者協會。

國家教委思想政治司。1989。《驚心動魄的 56 天》。北京：大地出版社。

- 崔衛平。2008。〈為甚麼沒有春風吹拂大地：中國八十年代人道主義論戰〉。《思想（6）鄉土、本土、在地》6：19-50。
- 張萬舒。2009。《歷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實錄》。香港：天地圖書。
- 曹思源。2014。〈關於修改憲法的四點建議〉，取自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focus_on_china/2014/03/140303_cr_revise_chinese_constitution。
- 焉然。2009。〈孫立勇專訪：在寒夜裡敲響希望的「鐘聲」〉，取自 <https://hao274.wordpress.com/2016/05/15/孫立勇專訪-在寒夜裡敲響希望的鐘聲我的1989系列訪-2/>。
- 陳小雅。2019。《八九民運史》。公民社。
- 陸祀。2004。〈憶北師院競選人大代表的張中天〉，取自 <http://beijingspring.com/c7/xw/wlwz/20040101131629.htm>。
- 新華網。2018。〈改革開放四十年大事記〉，取自 http://www.xinhuanet.com/2018-12/17/c_1123861055_2.htm。
- 趙常青。2010。〈民主應該是我們大家共同的事情——專訪《零八憲章》簽署人之一、「北京工自聯」領袖白東平〉，取自 <https://1989bbs.blogspot.com/2010/02/blog-post.html>。
- 劉曉波。1992。《末日倖存者的獨白：劉曉波的「六四」回憶錄》。時報文化。
- 歐陽小戒。2015。〈北漂逸聞錄：孫立勇與陳晏彬〉，取自 <http://minzhuzhongguo.org/MainArtShow.aspx?AID=52665>。
- 魏京生。1979。〈第五個現代化：民主及其他〉，取自 <http://weijingsheng.org/doc/cn/46.htm>。
- 羅隆基。1930。〈論人權〉，取自 https://gardenstreet29.blogspot.com/2011/01/blog-post_17.html。
- 關嶺。2019。〈鎮壓六四誰「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共僅提鄧小平李鵬等五人〉，取自 <https://www.hk01.com/議事廳/359380/鎮壓六四誰-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共僅提鄧小平李鵬等五人>。
- 【未出版資料】香港支聯會。《八九民運原始及複印資料》。

Civilian Publications during the 1989 Prodemocracy Movement

Jiang Shao

Independent Scholar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format, content and role of the civilian publications during the 1989 pro-Democracy Movement in China. As the marches, sit-ins, hunger strikes, and occupation of Tiananmen Square in defiance of martial law, so too the copying and dissemination of civilian publications expanded from university campuses to the streets and the square itself. These publications ranged from big character posters and in-house pamphlets, largely confined to universities, to movable posters in public places in Beijing and other regions within China, and even outside. The study of what democracy meant in the civilian publications was the most significant matter of discussion during the Movement. The publication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unifying tactics during the Movement and establishing networks of resistance among various actors. They also inspired self-governing student organizations and other autonomous organizations based at Tiananmen Square as well as multiple acts of resistance across generations, social class and ethnicity. The publications did not believe that dialogue with grassroots society was an effective or sustainable approach in turning the movement's earliest claims into a pro-democracy movement for all. 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democracy and economic democracy did not become an influential issue in the Movement. Civilian publications failed to discer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mocracy, patriotism and self-strengthening of the nation. In the latter stages of the Movement some leaflets over-emphasized the occupation of Tiananmen Square as the only center of resistance and failed to promote autonomous organizations among workers and other grassroots' actors as multiple centers

of resistance. The publications provide valuable lessons for future global democracy movements that seek to end autocracy and empires, including the totalitarianism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Chinese Empire, and a way out of a crisis for democracy.

Keywords

citizen publications, the 1989 prodemocracy movement, June Fourth Massacre, agendas and discourse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mocracy, multiple centres and methods of resistance
